

胡适治学方法及其与朱熹、戴震学说的渊源

芮常木,肖泉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胡适,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是其通过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方法论的吸收、借鉴、消化、改造而成,胡适学术思想与朱熹、戴震的学说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胡适;戴震;朱熹;乡情

中图分类号:B2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1-0022-03

在胡适的著述中,每当叙述朱熹或戴震时,往往在他们的名字前冠以“我的老乡”,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乡情。如此深情,人们也许会误会朱熹、戴震同胡适不仅是“老乡”,而且是同时代的好友。实际上,朱熹是南宋哲学家,而戴震是清代思想家,两者相距500多年;至于胡适,是现代学者,与戴震也相距200多年。他们相距的时间虽很遥远,但他们的故里都属徽州,都生存在“山谷崎岖,峰峦掩映”这样的空间中,都是徽州老乡。徽州人重乡谊,胡适尤甚,对故乡人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唯桑与梓,必恭敬止”,^[1]发自内心,融化于血液。当然,胡适对朱熹、戴震如此亲切,不仅限于乡情,更重要的是朱熹、戴震的思想哺育了他幼小心灵的成长,并一直深深地吸引、影响着他。胡适认为自己幼时的启蒙教育就是读了朱熹的《近思录》,其中“学原于思”深印在他幼年的脑海中,敬为千古圣言,从而引导他重视思想方法的研究;后来,考上留美官费生主要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考证文章,得了高分。这个关键的成功,使他对思想方法的研究兴趣更浓,促使他一生走上了以方法为主体的治学道路。

通览胡适的学术思想,方法论的确是其核心。他自己也说:“我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40年来所有的著述。”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他看来,“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足,不能使人信服”。^[1]这个方法,是他通过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方法论的吸收、借鉴、消化、改造而成,是属于胡适自己的独特的方法。

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论中,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一生的学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杜威把实验主义界定为“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其核心就是“五步思维”。简而言之,首先观察事实,搜寻例证,即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种种假设,并推出其可能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演绎;然后,再把自己的假设拿到事实中去验证。胡适接受了杜威这个思想,但不是照搬、照抄。实际上,胡适在师从杜威之前,对治学方法已有最初的感悟,这个最初的感悟,就是徽州文化的心理积淀,是从朱熹那里获得的。胡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聆听杜威的教诲,并接受杜

收稿日期:2008-10-15

作者简介:芮常木(1961-),安徽旌德人,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徽州文化;

肖泉(1938-),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老干部处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徽州文化。

威的实验主义。

现代人类学指出,人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去学习新的东西。胡适当然也不能例外。美国人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说,胡适的“早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底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2]胡适自幼读书,就是“四书”、“五经”,且日复一日地反复诵读,细雨润物,浸渗弥深。如此地对“朱注的认识和训练”,使胡适深感朱注“比较近情人理”,朱熹理学就这样在熏陶中内化为胡适本人的治学原则。胡适自己也认为“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3]那么,朱熹给予胡适的治学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归纳的方法和怀疑的精神。“即物穷其理”,“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这便是归纳的精神”;^[4]治学应先存怀疑、辨伪之心,然后立说,即“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有疑”,也就是“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过了一番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5]这便是怀疑的精神。胡适就是在徽州文化这块园地里吸取了朱熹的这些思想,并承继这样的传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见到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心有灵犀,一拍即合,从而在方法论上取得交融。

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情有独钟,因为这是他所要寻求的“致用哲学”,于是想把它介绍到中国来。但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西方的思想学说,要输入中国,并在中国扎根、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就必须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为此,他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结合点,找到移植的合适土壤。于是,胡适认真考察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发现从宋学到徽州朴学都具有一个基本精神,即怀疑、辨伪、求是。胡适认为,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方法”、“实验的方法”以及“假设”、“求证”等等一套思想规则和运作程序与中国传统考据学、训诂学并无实质的不同,而且有相通的一面。胡适指出,“在那个时候,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6]

胡适特别具体地研究了清代朴学方法论。他认为清代朴学的方法论原则主要表现在,每一种新见解,必须有例证,即“举例为证”;之所以能举例作证,是脑子里先有一种假设,即“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证明假设的是非”。^[7]这一方法论原

则,就是“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因此,胡适总结出了“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的精辟见解。并且他认为,清代朴学的方法论原则,戴震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作了充分发挥,诸如“因物求则”,重实证,尊重事实,也就是“有证据的探讨,即无证不信”。这种方法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因此,胡适把目光转向戴震,系统地研究了戴震的哲学和方法论。他特别欣赏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八字方针,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从而把“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方法”,于是成为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在以考据为核心的基础上吸取了实验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形成的方法,是胡适所倡导的“拿证据来”的实证精神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具体体现。胡适说:“我从考据学方面着手逐渐地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学会了这种方法。”^[8]这个方法要求研究学问,首先详细占有资料,从大量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先形成一个初步的看法,然后提出大胆的假设;为了证实这个假设,再细心去求证据。在胡适看来,这一方法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很好地实现了演绎和归纳,也就是假设与求证的统一。应该说,这种治学方法确有可取的地方。胡适曾把它运用于学术实践,他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对《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十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为戴震的《水经注》辩诬过程中,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从而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有价值的成果,他的学术追随者也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

虽然如此,应该如实地看到,这个治学方法,的确不是一个完善的科学方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大胆的假设”有鼓励人们敢于突破旧有结论束缚的积极作用,但是,孤立地讲“大胆的假设”,而且不设立假设的前提条件,一味主张“愈大胆愈好”,必然导致主观膨胀,从而使假设滑向主观唯心主义的陷阱。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就是类似的主观唯心主义所造成的荒唐闹剧。其次,“小心的求证”,即主张“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也就是“教人举例”。既然如此,例证的取舍只能由研究者决定,这就不可避免会包含着研究者的主观意志。这样,

即使有了例证,也不保证结论是科学的,其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全有可能为任何一种选择性的观点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例证,这正如列宁所说的使“举例”、“求证”陷入“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最后,讲求证据的方法在本质上限定了只能解决具体的个案问题,只承认对各个个别事物的分别认识,承认在若干认识基础上所作的归纳,充其量只能查明具体事情的真相,一旦面临作全面的判断和抽象的概括便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可以考察一下胡适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搜求证据勤奋,运用证据严谨,但往往第一步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就未能再深入下去,这与他的“科学方法”给他带来的限制有很大关系。可见,这种治学方法的缺陷是明摆着的,但是胡适没有看到,也不能看到。

回眸胡适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深深叹惜。一生反对“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胡适,相反却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居然把实验主义当成自己“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有人说:“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底思想有所‘怀疑’。”胡适确实如此,他在这里走进了悖论。但也不得不看到,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对接通中西文化作了一次尝试。其实际意义,与其说作为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不如说其中所体现的科学实证的理性精神对于改变中国传统思维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艾思奇也说过:“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先锋。”^[9]“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参考文献:

- [1]胡适.四十自述[M].台北: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
- [2](美国)人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万德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曹伯言.胡适自传[M].合肥:黄山书社,1986.
- [4]葛懋春,等.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5]艾思奇.通俗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8.

责任编辑:高 煊

Hu Shi's Scholarly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Zhu Xi and Dai Zhen: A Relation Study

Rui Changmu, Xiao Quan

(School of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thinker in modern China, Hu Shi is known for his scholarly methods which find their very expression in his words "boldly making hypotheses and carefully seeking proof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methods saw his meticulous securit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ly methods as to make them identical in nature with modern Western scientific ones. By analyzing his methodological adjustm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very link between Hu Shi's scholarly methods and the theories of Zhu Xi and Dai Zhen.

Key words: Hu Shi; Zhu Xi; Dai Zhen

胡适治学方法及其与朱熹、戴震学说的渊源

作者: [芮常木](#), [肖泉](#), [Rui Changmu](#), [Xiao Quan](#)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文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1)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条)

1. [胡适 四十自述](#) 1986
2. [人格里德·万德岑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1991
3. [曹伯言 胡适自传](#) 1986
4. [葛懋春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1981
5. [艾思奇 通俗哲学](#) 1968

相似文献(9条)

1. 期刊论文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平议胡适之“戴震观”之一](#) -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1, 18(1)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其人,是我们徽州人中的一先贤,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因此,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首创“戴学”。“戴学”即“戴学”。
2. 学位论文 [刘巍 二三十年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戴震研究](#) 1998
与以往就学术史而论学术史的研究取径有所不同,该文试图提供从思想史看学术史的独特视角,以二三十年代梁启超、胡适、钱穆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为个案,在对基本文献深入细致的辨析梳理的基础上,论证、凸显了他们之间寓于学术见解中的思想交涉。该文的旨趣,不在于品评其研究成果的得失高下,而在于阐明梁胡钱三家各自思路之所以然及其内在关联,从而揭示春清学史整理的思想意义,为重建清学史做些前提性的观念清理工作,并由此去倾听他们寄托于历史研究中的现实感怀。该文认为,梁启超与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褒扬中的意见分歧,其意义可联系科玄战获得深入的了解。这是科学派(胡适)与折衷派(梁启超)的思想分歧折射到戴震研究的反映,钱穆对戴震则力加贬抑。其“尊崇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和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梁、胡、钱心目中的戴震之异同离合,是现代思想史上科玄论战及其延伸、历史上“理学与反理学”思想斗争之继续的一个投影。
3. 期刊论文 [白盾, Bai Dun 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 ——从朱熹到戴震、胡适的徽州文化发展轨迹](#) -黄山学院学报 2005, 7(1)
徽州文化中的朱熹、戴震和胡适这三个人物的出现正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理学为始点,戴震的反理学是对朱熹理学的颠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则是对整体儒学的颠覆。这之间的发展线路正好是巨大的“否定之否定”。它显出徽州文化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发展线路及其意义和性质。
4. 期刊论文 [张奠宙, Zhang Dianzhou 清末考据学派与中国数学 ——科学\(上海\)2002, 54\(2\)](#)
看到最近几期《科学》上关于“自然国学”的讨论,觉得其中有不少问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建立,总要有一些研究加以支撑。因而不揣冒昧,想在这里谈谈清末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影响,特别是对数学和数学教育的影响。事实上,“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是密切相关的。
5. 期刊论文 [张彤磊, ZHANG Tong-lei 戴震的学术思想分期研究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7\(6\)](#)
戴震兼擅义理与考据,在乾嘉学术史上独树一帜。乾嘉以来,学者对戴震学术思想定位不同,对其学术思想分期也持论不一。梁启超、胡适、钱穆、余英时等近现代学者都对戴震的学术思想有过不同阶段的划分。文章在学术主体视界下探讨戴震的学术思想分期,并分析戴震各阶段的学术思想特点及其各阶段学术思想嬗变的内在原因。
6. 期刊论文 [徐道彬, XU Dao-bin 假设与求证:戴震考证方法论刍议 ——皖西学院学报2008, 24\(1\)](#)
胡适化用戴震“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以之作为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典型示例教育后世。然而,戴震重视运用假设与求证方法的具体实践,令人很少论及。从材料出发,对戴氏反对凿空和株守,倡导归纳和推求的考证方法加以推阐,可为我们今天国学研究的提供借鉴。
7. 期刊论文 [李帆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震 ——以清末民初学者对其考据学之“科学”性的评估为核心 ——黄山学院学报 2004, 6\(4\)](#)
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在总结清代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引入了自西方而来的科学视角看待考据学,特别是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考据学,力图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发掘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以利于正处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
8. 期刊论文 [吴根友 精神现象考古的知性价值与文化学意义 ——读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 ——江汉论坛2002\(8\)](#)
如果说,20世纪初,以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戴震研究,凸显了戴震哲学的现代性价值,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哲学界的戴震研究则主要展示了戴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突出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徽学术界同仁整理、出版了《戴震全书》和《戴震全集》,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戴震提供了最为丰富、全面的资料。
9. 学位论文 [张利明 胡适的传统文化观](#) 2007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长期以来胡适一直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本人,则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来概括自己从事的文化活动。那么,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有必要关注胡适的思想学说,从胡适思想本身出发,不但能使我们了解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胡适思想的理解。胡适一生所致力的事业与追求,无论其以政治、思想、学术或其他形式表现,总的可概括为四大项,那就是“科学”、“民主”、“实验主义”和“自由”。按照胡适的解释:“科学”是一种方法,合乎逻辑,合乎法理,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实验中求出真理来。“民主”则是一种人类生而平等,与生俱来就有的

谁也无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个体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就是反对独裁和专制，实施民主和法治。“实验主义”则是一种由哲学向科学过渡期的哲学。它没有终极真理，只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随时制造，随时扬弃，并非一成不变的。至于胡适终生所追求的“自由”则是在科学、民主、实验主义交互为用的配合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较为合理的状态。本文更多地从民主、自由、治学方法等方面多角度地探讨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建树与贡献，讨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汲取。

胡适少年时期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式教育，其文化背景可以说是以传统旧学为底色。他早年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从他获得的教育内容、伦理规范、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等多方面得以印证。早年的教育对他人生的影响也很大。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在对自由的阐述中指出自由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存在绵延不绝的自由思想，从墨子、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追求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到了晚年，胡适总是援引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来阐释当今，更多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继承文化中的精髓遗产，以促使自由民主与社会进步。中国的民本主义是胡适民主思想的渊源之一，胡适始终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就是民主。他说：“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淮南王书》最能体现胡适具体民主思想和政治主张。胡适将《淮南王书》中的无为政治与当时国情实际的“与民休息”观念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探究其政治思想，概括为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制，二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三是变法而不拘故常。胡适在满怀认同与赞赏地论述《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时，已经融入了自己的民主概念与法治理想，阐扬民主，推进法治实际上成为他的骨鲠之言。

本文最后一章探讨胡适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整合。综观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他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的“科学方法”。文中着重从朱熹、戴震的学术脉络来分析其传统学术的渊源、精神，以及胡适的认同和改造。朱熹的“看文字须如法官深刻，方穷究得尽”，对胡适的影响很大。胡适推崇戴震“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并将其发展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皖学是他胡适终身倡导治学方法的根源，他受皖学影响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知的程度。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皖学决定的。他一生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哲学方面、古小说的考证与《白话文学史》及疑古精神等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当理性的，曾说过：“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迁进化的最高结果看。”并认为这是一种可以使人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很有用的方法，胡适指出各种时代的一切文艺复兴运动、一切思想变迁、宗教改革乃至一切文化生活的变迁，都是无法摆脱传统影响的。正如胡适所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出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澈的中国根底。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1006.aspx

下载时间：2009年10月23日